



被遺棄的鄉村不能遺忘

應明

按照通常的說法，中國基督教的高速發展始於1970年代末，雖然也有人認為之前的三十年在少數地方也有所發展，但總體來說仍是「不可見的」(invisible)。雖然我們不能將其與中國政治社會的變革進行簡單的因果關聯，但確實可以看到至少在時間上的相關性。一般也認為1980年代是鄉村教會的大復興時期，而城市教會是從1990年代以後才開始有比較大的發展，儘管之前城市裏當然也有一些教會存在。事實上，從可見的歷史資料我們甚至可以說，1950年代以前，中國教會的主體是在城市，至少從宣教資源的投入來看，顯然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這也反過來可以說明，為何中國教會後來的幾十年中，對於進入中國廣大內地農村甚至邊疆地區的一些宣教機構或傳道人有著特別的尊敬，因為這些人成為後來鄉村教會大復興的「英雄」或「屬靈前輩」，例如中國內地會，例如寫出《無名的傳道者》的邊雲波，例如遠赴新疆的趙西門，以及眾多真正無名的傳道人。

1990年代的城市教會發展常被認為主要與1989年有關，這當然有相當的道理，特別是對於所謂知識分子群體的歸信以及校園團契的興起，無疑有著

非常直接的關係，更不要說如今海內外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一些教會領袖都可以簡單歸類為「89一代」。但從總體來說，中國城市教會的發展似乎與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所謂「深化改革」而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及快速城市化進程，有著更大的相關性。我始終認為，儘管知識分子有著說話的權利或至少機會，從而更多受人關注，是可見的(visible)，但是真正帶來教會深層次變化的，其實是更多不可見的普通人，而由眾多的普通人構成的大眾運動(mass movement)才具有真正長久的動力。

中國經濟自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經過二十年的積累，集中體現為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以及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二十年中，也正是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最為快速的時段，大概可以從以下幾個主要時間節點的城市化率資料得到說明：1949年為10% (總人口5億4,000萬)，1978年為18% (總人口9億6,000萬)，1990年為26% (總人口11億6,000萬)，2000年為36% (總人口12億)，2011年為51.27% (總人口14億)。這些冷冰冰的數字不單單說明鄉村向城市貢獻了大量的新人口，更是反映出鄉村的空心化和迅速的衰敗。

除了那些被快速捲入城市發展和擴張的城市郊區村莊之外，總體來說，過去二十年來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鄉村的衰落，甚至一些中西部村莊幾乎被廢棄。2012年10月全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提到，在過去十年中，每天有80至100個村莊消失。雖然他的資料不一定準確，也沒有考慮到廣泛進行的撤鄉併村的行政性因素，但他的這個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快速城市化的進程及其對鄉村社會帶來的劇烈影響。最簡單的層面上說，鄉村為城市輸出了大量青壯勞動力，而老人小孩及婦女則淪為「留守人口」。

與中國社會這個劇烈變化相應的是，鄉村教會也為城市教會貢獻了大量「新」信徒。這尤其體現在我們曾觀察過的上海、北京三自教會近幾年新受洗的信徒，其中越來越多是「鄉村—城市新移民」；分佈廣泛的城市家庭教會也是如此，真正原居本地的信徒並不多，絕大部分都是所謂「新北京人」、「新上海人」。這直接帶來了城市教會這些年的快速增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增長相當部分只是對於城市教會而言的新信徒，因為這些進入城市教會的基督徒中的相當一部分本來就是鄉村教會的成員，儘管可能其中有些人沒有在鄉村教會受洗。

與城市教會的發展相反，近二十年來作為信徒輸出來源的鄉村教會則一直在經歷信徒流失的痛苦，同時，在經濟發展及城市化進程背景下，「一切向錢看」的物質主義也一直在侵襲教會及信徒。鄉村教會的狀態從大復興的熱火朝天，還沒有來得及建造根基，就面對「人走了」、「心亂了」所帶來的「教會軟弱了」的局面。畢竟，教會的軟弱或荒涼，不僅僅是人數的問題，更是心的問題。

一些大型鄉村教會體系在此過程中或主動或被動地進入「轉型」，說是其主動，乃是因為他們領受了「羊在哪裏，牧人就在那裏」的信息，從而跟隨其流失到城市的信徒進行牧養，進而建立農民工教會；說其被動，是因為相當一部分情況是他們的

傳道人在2000年前後分別遭遇到非常嚴峻的政治壓力，因而從家鄉的鄉村教會轉向不同的地方，特別是生存空間更多樣的城市。然而，多數鄉村教會並不具有中華福音團契、穎上團隊等這樣的資源和遠見進行轉型，而更多的是相對被動地承受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種種衝擊。

事實上，信徒甚至傳道人的流失，僅是衝擊中的一種，就如城市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衝擊一樣，隨著城鄉教會態勢的變化，原本佔據中國教會絕對優勢和主體的鄉村教會，淪為城市教會的幫扶物件，從「鄉村包圍城市」進入城市絕對中心的階段。而實際上，城市教會的神學/體制/儀禮在很大程度上都與鄉村教會/鄉村社會存在差異。在幾十年的自發式平信徒教會運動中，基督教在中國鄉村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成為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地方」基督教形式，而不僅僅是某種宣教教會的簡單複製。如此說絕不意味著為鄉村教會所有的信仰實踐背書，或無鑒別地接受其全部的神學/體制/儀禮。這裏更要強調的是，鄉村教會不應該只是作為城市教會的「學生」，簡單地照搬城市教會的一切。就我們有限的觀察來看，很多從城市教會回流到鄉村教會的信徒，對原來的鄉村教會擁有相當多的不滿或不適應，更不用說從城市教會主導的神學院培訓後回到鄉村的傳道人，對於原來的鄉村教會的批評，甚至嚴厲批判，其根據就是他們所學習來的某種神學立場、某種教會的實踐。

筆者這麼說，也絕不意味著為鄉村教會一味地辯護，認為鄉村教會不需要反思和改善，事實上，鄉村教會與城市教會一樣需要悔改，需要聖靈的更新和焚燒。與城市教會普遍強調「真理」/聖經/知識相應，鄉村教會給人留下的印象一般來說是強調「生命」/禱告/相愛。然而這些年以來，很多人的觀察都認為鄉村教會的禱告已遠遠不及二十年前那樣的強度和熱切，「中國的早上五點鐘」也被替換為「中國的早上九點鐘」，如果還有「九點鐘」的禱告的話。更為重要的是，教會中的言行及禱告中

的表現就算還相當「屬靈」，在鄉村教會稍微長一些時間就會發現，眾多信徒的日常生活相比於非信徒並不能看到明顯的差別。這種信仰生活的表面化，或者說主日/口頭上的基督徒，顯然不是城市教會才在面對，才需要面對的問題。

對於中國廣大鄉村教會來說，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貼上所謂「民間宗教化的」標籤，但一些信仰實踐，至少從觀感上來說，確實與地方民俗非常接近，以至於教會似乎僅僅是廟宇的替換，基督僅僅是一尊更有能力的神靈，聖經則更接近於民間傳統的辟邪符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村教會確實需要有更系統、更認真的聖經閱讀、闡釋和應用，需要有更好的知識上的裝備，儘管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這不意味著某種神學派別的簡單照搬或「殖民」。

信仰表面化更多的體現在二代/三代/n代基督徒的「家庭傳統」式信仰。近幾年城市教會越來越關注兒童事工以及青少年事工，因為從1990年代後期成長起來的城市教會，不得不面對第二代的問題。對於鄉村教會來說，由於發展時間較城市教會來說要早至少十年，還不論及一些歷史更為悠長的村莊或民族群體，他們早就遭受到了信仰代際傳承的挑戰。這當中當然不乏正面、積極的「好見證」，但能看到的更多似乎是「屢戰屢敗」的案

例。在一些村莊教會中，就算還有一些年青人留在村莊或在附近的城鎮就業，但能夠堅持聚會、禱告、讀經等基本信仰生活的二代/三代基督徒並不多見，連主日基督徒都談不上，最多不過是「聖誕節基督徒」，如果你還能稱之為基督徒的話。

說了這麼多鄉村教會的危機和問題，目的在提請更多有心人的關注和幫助。實際上，一些地方的鄉村教會已經意識到這些挑戰，並已經有意識地進行調整和改善。我們也確實看到一些真正擺上的無名傳道人在各地委身服侍，在不少鄉村仍然傳講福音，建立教會，「主將得救之人天天加給他們」。上帝沒有忘記鄉村教會，因為在那裏有祂的百姓。

簡言之，在如今城市化大潮中，中國教會也隨之而將重心轉入城市，一方面表現為城市教會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教會資源投入的轉向。這當然無可厚非，而且也確實是未來中國教會的，甚至可以是大的方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放棄村莊。「羊在哪裏，牧人就在哪裏」固然是對的，但這也不意味著鄉村教會人數減少了，真的就將鄉村教會遺棄，就如城市化大潮對鄉村的遺棄一樣。畢竟，村莊雖然在消逝中，但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就不應當被遺忘。

（作者為中國高校教授）

